寺记》的碑文抄件，是1964年全省文物普查时存下来的。《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碑原件已不存，但是碑文曾著录于《海城县城》。这一碑记，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是关于金塔寺的历史文献，又是银塔寺万历44年《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的参证材料。

《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的全文，充斥着空洞的佛教说教，其中实质性的记述，是说善士胡景柱等输资，重修了一座寺院，又有僧宗信等输资，金饰了佛面，并造了渗金佛像。将它与《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对勘，居然发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就是后者的文章间架格式完全是套袭前者，那些空洞的佛教说教，更是完全照抄，仅仅是将善士及僧人名及修建项目等具体内容更换了。考后世碑文，部分词句摹仿前代碑文者，诚或有之，但是象这样前后只差了短短五年，竟然如此生吞活剥、剽窃抄袭的现象，却极为少见。更有甚者，《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云："恢修大殿三间上二，右左斋房列两傍，山门洞开渐豁达"，什么叫"大殿三间上二"呢？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仔细对照，原来这也是生套来的。《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云："恢修大殿三间立于上，二殿五楹居于中，伽兰在东为左辅，佛祖在西为右辅，禅堂斋房列两傍，山门洞开渐豁达。"金塔寺重建是按毗卢宗的格局建了前后二殿，银塔寺规模差小，只建了一重殿，没有大殿立上，二殿居中那样的实际情况，却还要生剥硬套，而又没有剪裁好，就弄成"大殿三间上二"，于是不成文意。

发现万历44年《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是生吞活剥万历39年《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这对于我们颇有用处，可以将银塔寺残碑已剥脱和断失的文字，据金塔寺碑记补录出来，第1行标题则仍依园田一龟的录文。于是这一方《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的全文，就可以完整地复原著录出来了。为了清楚方便，现依原碑格式，将碑文原文著录如后，以存地方文献。著录仍以我所见原件为准，推定复原的文字，圈在□内，用"」"分行次。（见附录）

银塔寺碑记全文复原著录出来之后，关于海城金塔及银塔的两件万历年间的碑记，我们就一共掌握了四种材料：

1.《海城县志》著录的《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

2.1964年全省文物普查时抄存的《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

3.《满洲金石志稿》著录的《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

4.经我于1975年调查抄存，并据以上三种材料校补，最后著录的《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全文。

以上四种中之最后一种，曾据其余三种校补，所以最后得以著录完整。反过来，根据这一著录，又可校勘前三种当中的部分误字，兹不详述。

《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第5—6行云："又幸僧海见等各发虔心广化众门，重建宝塔，永垂修（休）名于后世。""建宝塔"三字原碑甚清，园田氏录文亦同。"建"字上一字不存，推断只能是"重"字，"重建宝塔"，上下文意尽合。再对照《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先说善士胡景柱等输资恢修大殿、二殿、伽兰、祖师二堂，以及禅堂斋房山门，接着又说僧宗信等"金饰佛面"，并"造渗金佛一堂"，只说了建寺造佛，压根儿没有说起塔的事，而现存的金塔，则确属辽代原构，这表明，金塔寺在万历39年重修前，因"迩年被虏"，旧寺已毁，但是旧塔尚存。《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先说是善士胥得荣等输资建大殿、左右斋房及山门，接着又说僧海见等输资"重建宝塔"，先说建寺，后说建塔，这表明，银塔寺在万历44年重修前，因"迩年被虏"，旧寺已毁，旧塔亦已不存了。

综上所述，根据《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重建宝塔"的记载，对照现存银塔的雕刻作工和砖型，可以断定，此塔正是重建于明万历44年，即公元1616年。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靠得住的，证据也是充分的。目前，上海博物馆已试验成功用热释光方法鉴定砖瓦和陶器的年代，误差可在10%以内，因此，海城银塔究竟是金代所建，还是明代所建，还可以用热释光方法作最后的判定。不过我深信，采用现代科学方法鉴定出来的结果，必将进一步证实我这个结论，我愿意把推考的结论说在前头让科学的实践再作检验。

本文开头说过，三十年代以来，日人在我东北地区作考古调查，断定古塔年代，拍定的许多金塔，大都弄错了。他们不仅把许多辽代的塔定成了金代，像海城银塔这样，又把一座明明有碑记为证的明代的塔，也给定成为金代，这个事例，就更加耐人寻味了。这是很值得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加以深思的。

三十年代以来一些日人把东北地区的不少辽塔甚至明塔都定成为金塔，这一方面表明他们不学，对于辽、金塔和辽金式塔的断代，可能真的拿不准，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他们很可能是别有用心，他们标榜金代文化，那是为巩固伪满的统治，是带着框框的。我觉得，把银塔硬定为金代，就明显是属于后一种情况。

关于海城银塔的建造年代，已考述如上。这里还要顺便讨论一下铁塔的建造年代，以为本文的结束。

铁塔自伪满以来，也被断定为金代所建。《辽宁史迹资料》未深入调查，也说是"金代所建"。关于铁塔的建造年代，现在虽然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材料可资稽征，但是从塔的造型和雕刻风格上看，应是辽末所建，推测大约在辽道宗至天祚帝时期。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新的见解了，因为早在1905年，日人伊东忠太就曾推断铁塔是辽末所建，伊东氏的理由是铁塔与朝阳黄花滩塔风格相近。他的理由不能令人赞成，但是结论我认为还是正确的。看起来，早年日本学人的立论，还是能够不带框框、实事求是的。

附录：重修古迹宝塔寺碑记

夫寺之设也无异而其名匪同岂无故哉奉弟」先朝圣天子敕建银塔寺盖因山寺鬼峻灵秀泄锺河流洋溢庆瑞迭现自是飞潜动植类斯咸若创刱一塔镇重胜」境其基威严可堪立寺遂建不世之功业哉迩年被虏残破倾颓已久幸得巡按承差胥得荣等慈爱素抱慨然有」利济之施各输已资沛然有倡众之会而恢修大殿三间上二左右斋房列两傍山门洞开渐豁达又幸僧海见等」各发虔心广化众门重建宝塔永垂修名于后世嗣是完满一会告厥成功善士胥得荣等希余言以为记余曰此」文未娴不得已而强以为言吾闻佛出西域生自成周自古志之所以」汉朝梦感白马西来梁武多为」施楚王敬信沙门朗香得烟至今不灭昔[illegible]以来所为敬信者亦甚哉劝化众德」利济成功而甘劳不辞者不过祈佛默估职是故耳况当国家非宁之日值苍黔扰攘之秋倘佛主照大显威灵则」俾波恬尘静奠宗社于苞桑物阜民安纳闾阎于春台风调雨顺斯享乐利于无疆五谷丰登亦歌太平于有象是[illegible]乃佛祖之潜佑吾人之诚恪不较著明验么不则佛无益世世何修为虽然神人一理未有人事尽而神不默受者」也故曰诚之不可掩也如此夫于是为序」功德主胥得荣□刘世武海受」宽奉海口定安」海见、洪通定全」海德常福定口」

时大明万历肆拾肆万年岁次丙辰孟冬越吉旦

汎按：首行碑题今已全失，只能按《满洲金石志稿》补录。第2行《满洲金石志稿》著录为"夫□之设也无异而□□□□□无放哉弟奉"，其中"无放"显系"无故"之误，"无"字以上13字今已全失。《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之第2行为夫寺之设也无异而其命名也匪同揆厥所自岂无故哉弟奉"，较此碑多6字。我这里的录文，打在□中者，系参照二者增减。其余断失和泐失文字，均按《重修敕建金塔大禅宝林寺记》补录。功德主胥得荣等题名，原排在第13至16行下部，"海德、常福、定口"三人原排在末行年款之下。

辽宁文物　2期

辽契丹大字铜印谁识

李宇峰

今年4月，辽宁桓仁县八里甸子乡马路泡子村村民赵令清在山坡上种地时，发现一方古代铜印。



辽契丹大字铜印

印呈正方形，边长7.2厘米，厚1.5厘米，印钮长3.1厘米，高3.8厘米。印面刻九叠篆书四字（见图），印背无边款，仅阴刻"上"、"下"两字以示方向。

经初步比较，此印可认定为辽代契丹大字铜印。印文中最后一字可识读为"印"字，余三字不识。契丹大字铜印在辽宁省凤城、喀左、盘山、内蒙古赤峰、奈曼和新疆伊犁等地均有发现，因此，有关契丹大字的识读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文物报　1989年11月17日45期